

# 略论宋代铜钱外流高丽问题

钟兴龙

**[摘要]** 以北宋徽宗崇宁年间为界,宋钱外流高丽的状况和方式,分为两个阶段。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界,宋朝针对铜钱外流高丽的禁令分前后两个阶段。宋钱流入高丽使高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使高丽融入宋朝的货币体系中,成为东亚货币体系中的一员。宋钱外流,客观上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赋予了东亚世界经济的特征。

**[关键词]** 宋代;铜钱外流;高丽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4)06-0066-04

**[收稿日期]** 2014-05-29

**[作者简介]** 钟兴龙,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唐宋经济史研究。(吉林 132033)

关于宋代铜钱外流问题,前辈学者有广泛的研究。<sup>①</sup> 以往学者的研究多注意宋钱流向少数民族地区和海外日本、交趾及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诸国,对宋钱流向高丽分析略显不足。本文试以宋钱外流高丽状况及途径、宋朝的应对措施和宋钱外流高丽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讨论。

## 一、宋钱外流高丽状况及途径

以北宋徽宗崇宁年间为界,宋钱外流高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宋徽宗崇宁之前,高丽没有建立自己的铸币制度,市场交换中主要以物物交换为主。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郭元来贡,自言:“本国城无垣墙,……方午为市,不用钱,第以布米贸易。”<sup>[1]</sup>卷487《外国三·高丽传》因此虽然有宋钱流入,也不是作为货币使用。“日中为墟,用米布贸易。地产铜,不知铸钱,中国所予钱,藏之府库,时出传玩而已。”<sup>[2]</sup>卷325《四裔考二》

高丽铸钱始于肃宗朝,史载:“(钱制)西北两朝,行之已久,吾东方独未之行。”“始制鼓铸之法,铸海东通宝。”<sup>[3]</sup>卷79《食货二》但是,铸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因与其以往习俗不同,造成其初期铸币流通并不顺利,“崇宁后,始学鼓铸,有‘海东通宝’‘重宝’‘三韩通宝’三种钱,然其俗不便也。”<sup>[2]</sup>卷325《四裔考二》因此,高丽虽已铸币,但其使用十分有限,到北宋徽

宗宣和年间,高丽市场交易仍以实物交换为主。这从宣和五年徐兢出使高丽所记见闻可知,“高丽故事,每人使至,则聚为大市,……崇宁大观,使者犹及见之,今则不然。盖其俗,无居肆,惟以日中为墟,男女老幼管理工技,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无泉货之法,惟贮布银瓶,以准其直。至日用微物,不及疋两者,则以米计锱铢而偿之。然民久安其俗,自以为便也。中间朝廷赐予钱宝,今皆藏之府库,时出以示官属传玩焉。”<sup>[4]</sup>卷3《城邑·贸易》由此推知,崇宁后,在其市场交易中,大宗交易以布帛和银为媒介,小额交易则以米。而这时流入高丽的宋钱主要是宋回赐之钱,被用作把玩之物。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高丽在崇宁之后始铸币,证明其经济已经开始逐渐摆脱物物交换模式,向货币经济发展。据《高丽史》卷78《食货一》记载,高丽在11—12世纪出现“富庶之治于斯为盛”,证明其货币经济有大的发展,当然这与宋钱流入逐渐增加有密切关系。

宋钱流入高丽及行用方式,前后期也有所不同。前期主要是朝贡贸易的产物,民间贸易主要以销钱为器的方式为主。后期自崇宁高丽铸币之后,流入主要作为货币流通。北宋时期,宋钱流入高丽以回赐为主,并以宝物的方式藏于府库。“中国所

① 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黄纯艳《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和周爱萍《宋明时期中国铜钱大量流入日本的原因初探》(《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等论文。

予钱,藏之府库,时出传玩而已。”<sup>[2]</sup>卷325《四裔考二》此外,这一时期宋钱流入也与高丽“民家器皿,悉铜为之。”<sup>[1]</sup>卷487《外国三·高丽传》的习俗有关。其习俗使其对铜的需求量很大,因此宋钱以销钱为器的特殊方式流入高丽应该很多。“海外之郡如高丽、交趾之国,一器一皿,皆铜为之。彼以铜非己地所出,乃聚奇产无名之货,来鬻于中国。中国之人受其异而贪其宝,争以泉货而市之,彼得钱以归,则铸为铜器以使其俗。”<sup>[5]</sup>卷10《钱议》因此,实际上由于有高额利润回报,销钱为器现象在北宋也十分严重,政府屡禁不止。<sup>①</sup>而针对宋钱流入高丽,宋朝实行了严厉禁令,但收效不多。从北宋末到南宋,随着高丽货币经济的发展,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日益扩大,而高丽自身的铸币能力有限,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宋钱就不再被销钱为器,而是作为主币在高丽行用,宋钱开始大量流入高丽。

宋钱流入高丽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贡赐贸易。史载,宋朝对于朝贡各国无不以厚礼回赐,而铜钱是回赐物品中重要的一类,如元丰二年“赐三佛齐国进奉钱六万四千缗”<sup>[6]</sup>卷299《神宗·元丰二年七月癸巳》天圣二年交州“诏回赐五千贯,示怀远”<sup>[7]</sup>卷12《李氏世家》但是,宋政府回赐高丽的物品中几乎没有铜钱。史料仅见一例:绍兴六年“高丽国使持牒官金稚珪、刘待举各赐绢一十三匹,银碗二只,间金镀银双鹿带一条,紫绶披袄、小绦绵袄、绢汗衫各一领。军士二人各钱三贯、绢十四匹。从四人各钱二贯、绢五匹”,“更令户部支赐金稚珪、刘待举银绢各一百匹两,余人银绢各三十四匹两。”<sup>[8]</sup>卷62之六〇同时宋政府通过对使节贸易的限制,防铜钱外流。据《高丽使条约》载“诸进奉人到阙,司录司及晓示行人许将物入馆,至设厅两廊与进奉人交易。”“诸下节日,听二十人番次出馆游看买卖。”<sup>[9]</sup>卷46《乞裁减高丽时间札子》“旧日听下节二十人番次出馆……日听十人番次出馆游看买卖,仍各差亲事官一人随。”<sup>[6]</sup>卷449《哲宗·元祐五年十月癸丑》大中祥符七年,诏“高丽使所至县市物,委长吏管句,勿令亏损远人,仍蠲其算。”<sup>[6]</sup>卷83《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月戊午》同时,宋前期以金银、缗钱等与蕃商的博买也造成一部分钱外流,但是很快即被修正。而博买完全在政府控制中,因此通过这种途径外流铜钱是很少的。第二,民间贸易。宋丽之间的民间海上贸易蔚然成风,朴真奭据《高丽史》统计,从1012—1192年,宋海商往高丽贸易共117次,其中能确知人数的有77次,共计4548人。<sup>[10]</sup><sup>99</sup>民间性质的海商贸易,多

不为史书记载,实际数字要更多。去高丽的宋商人被称为“宋商”“宋都纲”。据《高丽史》统计,北宋可见高丽显宗八年泉州商人40人,十年泉州商人100人,福州商人100余人,十九年泉州商人30人;德宗二年泉州商人55人,文宗三年泉州商人62人,十三年泉州2人。<sup>[11]</sup><sup>453</sup>可见宋丽民间贸易之繁荣,在双方贸易中缗钱被大量使用,虽受到政府严格限制,但是通过这种途径外流的铜钱不会很少,下文还会涉及,在此不赘述。第三,走私。铜钱是宋丽贸易间的重要商品,由于高丽对宋钱的需求非常大,因此,在宋政府严令禁止之下,走私成为宋钱外流的主要途径。如绍兴十三年,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舟重风急,遂沉于海。”<sup>[12]</sup>卷150《高宗·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丙午》由于走私利润丰厚,所以奸民富豪纷纷参与,“奸民相结,贮钱小舟,潜往海洋,纳诸巨舶,稍载而归。”<sup>[13]</sup>卷273《理财》甚至宋朝官员也参与其中。如宋朝屯驻水军每月现钱支給,但“(钱)自本州支出,则城下大舟径载入蕃国矣”<sup>[14]</sup>卷1《禁铜钱申省状》在不同时期,宋政府实行各种禁令限制,但收效甚微。

## 二、禁钱外流高丽政策的变化

“禁钱外流”是宋朝钱禁政策的主要内容。针对铜钱外流高丽实行的禁令,一方面受到宋丽政治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宋朝钱禁政策的变化相关,在不同时期有其自身不同的特点。

以北宋仁宗庆历为界,禁钱外流高丽的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仁宗之前,没有具体针对高丽的禁令,北宋所实行的统一的“禁钱外流”政策适用于高丽。北宋初到仁宗庆历时期,钱禁政策相对严厉,对犯禁者会给予死刑的处罚。宋仁宗之后到南宋时期,钱禁政策渐次细化,针对铜钱外流的禁令更加详细,但从南宋中后期对犯禁者似乎无死罪处罚来看,禁令有所宽松。由于初期铜钱外流高丽的问题并不十分严重,所以并没有出现具体针对高丽的禁令,但随着铜钱外流高丽日益严重,具体针对高丽的“禁钱出境”政策,从宋仁宗时期开始出现,并不断细化、严厉。

据前文可知,铜钱外流高丽前期方式主要是朝贡贸易的产物,民间贸易主要是为了销钱为器。崇宁高丽铸币之后,流入高丽的宋钱作为货币流通。因此在不同时期,宋朝针对铜钱外流高丽的禁令有不同特点:北宋仁宗到北宋末的禁令主要是通过禁

① 参见钟兴龙“唐代‘铜贵’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6期;《唐宋铸币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止双边贸易的方式,以期达到禁止铜钱外流高丽的效果。如宋仁宗庆历编敕规定“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并徒二年,船物皆没入官。”<sup>[15]</sup>《朝野群载》卷20 神宗元丰元年五月上批:“闻福建、两浙有旧贩高丽海商,知朝廷遣使,争谋以轻舟驰报,规求重赂。其下逐路监司觉察之,依编敕私贩新罗法,许人告捕,送五百里编管。”<sup>[6]</sup>卷289《神宗·元丰元年》由此可知,初期宋朝实行全面禁止私贩高丽的政策,但并没有完全禁绝,并且禁止海商往高丽贸易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到元丰二年开始立法具体限制海商活动。元丰二年正月诏:“旧明州括索自来入高丽商人财本及五千缗以上者,令明州籍其姓名,召保识,岁许出引发船二只,往交易非违禁物,仍次年即回;其发无引船者,依盗贩法。”<sup>[6]</sup>卷296《神宗·元丰二年》到元丰三年编敕又进一步规定“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sup>[16]</sup>卷8《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到哲宗时规定进一步细化。元祐五年十一月“刑部言:‘商贾许由海道往外蕃兴贩,并具入船物货名数、所诣去处,申所在州,……即不请公据而擅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即不请公据而未行者,徒一年,邻州编管,赏减擅行之半。保人并减犯人三等。’从之。”<sup>[6]</sup>卷451《哲宗·元祐五年》绍圣元年规定:“往高丽财本必及三千贯,船不许过两只,仍限次年回。”<sup>[8]</sup>职官四四之一三 由此可知,初期宋朝禁止与高丽贸易,主要是由于宋朝收缩的外交政策决定的,同时也为防止铜钱外流。其后虽允许与高丽贸易,但发布了诸多限制法令。但并没有限制住双方日益发展的贸易以及铜钱的外流。

南宋时期,铜钱外流高丽问题日益严重,宋政府继续限制海商贸易,同时开始颁布针对宋钱外流高丽的具体禁令。《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一三载:“杭、明州并不许发舶往高丽,违者徒二年,没入财货。”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六月“壬辰,诏申严沿海地分铜钱入蕃之禁”<sup>[12]</sup>卷168《绍兴二十五年正月至六月》孝宗乾道七年知明州赵伯圭:“伏详铜钱出界,法禁甚严,缘海界南自闽广通化外诸国,东接高丽、日本,北接山东,一入大洋,实难拘检,乞自今应官司铜钱不得辄载入海船,如有违犯人重作施行。”<sup>[8]</sup>刑法二之一五八 其后由于高丽朝贡中断,禁令更加严格,“历孝、光、宁三朝,使命遂绝。庆元间,诏禁商人博易铜钱入高丽,朝廷亦绝之也。”<sup>[2]</sup>卷325《四裔考二》其后“禁商人持铜钱入高丽”<sup>[1]</sup>卷487《外国传·高丽》禁令不断被重申。宁宗时,“庆元五年,宁宗下诏:禁高丽、日本商人

博易铜钱。”<sup>[1]</sup>卷37《宁宗纪一》理宗“端平元年,以胆铜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sup>[1]</sup>卷180《食货下二钱币》

综上可知,由于铜钱流入高丽的方式及双边外交关系的变化,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界,宋朝针对铜钱外流高丽的禁令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完全禁断与高丽贸易,其后采取限制贸易和直接限制铜钱外流高丽的政策。

### 三、宋代铜钱外流高丽原因及影响

铜钱外流与宋朝商品经济发展、铸币量的增加、宋钱币值稳定、在境外购买力大等因素有关。但根本原因,学界则归于宋钱作为通货在海外的行用,如黄纯艳认为“铜钱外流的根本原因是宋钱在海外诸国作为通货使用,而且需求量很大。……深受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传统文化影响的高丽、日本和交趾,与宋一样以铜钱为本位货币,流入的宋钱在这三国做主币行用。”<sup>[17]</sup>实际上,这种观点宋人就已提出,如张方平提出“钱本中国宝货,近乃与四夷共用。”<sup>[18]</sup>卷26《论钱禁铜法事》

对于宋钱外流高丽原因仍有两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在不同时期,宋钱流入高丽的原因不同。在高丽并未铸造货币之前,铜钱的流入主要来自回赐和民间贸易中对铜的需要。在高丽货币经济发展之后,宋钱才由于作为主币的原因流入高丽,并构成了高丽与宋一体的货币体系,这种完整的货币体系加深了高丽与宋的紧密关系。第二,铜钱作为贱金属货币,实际上不适合做大宗贸易的直接支付手段,但是,为什么宋丽贸易中对铜钱却有强烈需求?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货币自然属性的角度解释,因为宋钱在高丽购买力高于国内,所以铜钱冲破宋朝无数条禁令外流高丽。但还需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动力推动贱金属铜钱,冲破禁令外流高丽?笔者认为唐宋时期东亚世界的形成是最终推动力。汉唐时期,我们可以说文化是东亚世界运行的动力,到唐朝最终形成了文化格局下的东亚世界,而到宋朝,多种形式的经济贸易成为东亚世界的运转动力。其中宋钱在东亚世界的流动成为东亚世界紧密联系的润滑剂。正是由于东亚世界联系的加强,才造成宋钱的大量外流。可以说东亚世界的形成和发展是宋钱外流的根本原因。

宋钱外流促使宋朝海外贸易的扩大,标志着宋朝海外市场的拓展,同时有效地刺激了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但除此之外,对于宋钱外流高丽的影响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宋钱对东南亚各国是弥补其货币体系,但对高丽来说,其货币体系就是以宋

钱为主币,因此,宋钱流入高丽使其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铜钱代替实物货币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促进其货币经济的发展,最终使高丽融入宋朝的货币体系中,成为东亚货币体系中的一员。同时,货币流通弥补了宋丽之间的关系。虽然宋丽关系时断时续,但是强大的货币经济关系起到了弥合作用,使双方并未因此而疏离。第二,从宏观上来看,宋钱外流最大的影响是在东亚形成了一体化的货币体系。东亚地域开始形成一个密切联系的市场,而宋钱是这一市场的重要纽带,如果说唐代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那么宋代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进程。崛敏一将商贸关系称为“宋代以后东亚世界的特征”,并是“东亚世界的重要特征。”<sup>[19]8,11</sup> 唐宋时期东亚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唐朝时期东亚的文化交流铸成文化格局下的东亚世界形成,而到了宋朝,东亚世界中的文化交流已经让步予经济交往。朝贡的目的也由文化转为经济目的。而在这其中货币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宋钱外流客观上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赋予东亚世界经济的特征。

#### 参考文献:

- [1]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 [韩]郑麟趾. 高丽史[M]. 首尔: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

- [4] 徐兢撰,朴庆辉标注.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M]//李澍田. 长白丛书(五集).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 [5] 曾巩. 曾子固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6]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7] [越]黎崱撰,吴尚清点校. 安南志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8]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9] 苏辙著,曾枣庄点校. 栾城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0] 黄纯艳. 宋代海外贸易[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11] 黄纯艳. 宋朝朝贡体系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12]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3] 黄淮,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4] 包恢. 敝帚稿略[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陈高华,吴泰.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 [16] 苏轼. 苏东坡全集[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 [17] 黄纯艳. 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J]. 中州学刊,1997(6):141-145.
- [18] 张方平. 乐全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9] [日]崛敏一. 隋唐帝国与东亚[M]//韩昇,刘建英等,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李 丽】

## Comments on Copper Coins Flowing out to Korea in the Song Dynasty

ZHONG Xing-l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eihua University, Jilin 132033, China)

**Abstract:** Ther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before the Chongning domination of Huizong Song, the conditions and ways of the copper coins flowing out to Korea are different. Ther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before the Qingli domination of Renzong Song and after. The copper coins of Song flowing out to Korea changed Korea's economy, which made the Korea integrate into the currency system of Song Dynasty and became one member of the currency system of East Asia. The flowing out of the copper coins made East Asia become an integral currency system, which was provided with the feature of global economy.

**Key words:** Song Dynasty; Copper coins flowing out; Korea